

华文教学的基本字集中教学法刍议

李如龙

提要 从汉语汉字的基本特点出发,借鉴传统的启蒙教育方法及各种新的试验成果,提出了华文识字教学的基本字集中教学法。

中国现行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模式是从西方中引进的。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兴起的应用语言学可谓波澜壮阔,一浪高过一浪,新理论和新方法层出不穷,什么600句、900句,情景教学法、意念教学法,接二连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理论和方法是许多不同学科的专门家研究出来的,也经过教学工作者实践过,确实各有独到之处,也各有适用的场合。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而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紧跟”,亦步亦趋,并不认真的去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不想想这些方法并非唯一正确的灵丹妙药(如果是唯一正确的,也用不着过几年就更替一次了),也不愿意想想老祖宗的传统方法还有没有可取之处,恐怕也是学不好、用不好的。

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基本观念一是重语言、轻文字,认为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二是重口头语、轻书面语,认为书而语只是口头语的派生。这两种基本观念从方向上说并无不妥,语言教育自应着重于语言训练,外国人学汉语,甚至可以完全撇开汉字和书面语,专门训练口语。然而语言的训练也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既可以从语音和口头语入手,而后掌握文字和书面语;也可以从文字和书面语入手去掌握语音和口语。犹如登山,既可以从正面上也可以从背面上。如果有的外国人想着重训练阅读和利用汗牛充栋的中国古籍,尤其是日本学生已经掌握了不少汉字,对他们来说从背面登山可能还是一条捷径呢。

汉语有两个基本特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也是我们研究汉语教学法的时候不能不考虑的。第一,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差别很大,汉语的书面语不但典籍多,而且书面语的词汇、句型和表达手段一向都大量的、不断的向口头语输送;反之,大白话里的许多成分却难于写入书面语。第二,汉字对汉语来说并不是单纯的、消极的书写符号,而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绝大多数的字就是一个语素,汉字具有部分的语言功能。正由于有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古来的启蒙教育总是先识字后读书,由文字及语言,从书面语再回到口头语。尽管这种旧式的教学法也可以数出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来,诸如字形繁难、字义多样、字音无从捉摸,因而难于入门;重文轻语,导致言文脱节;十年寒窗,皓首穷经,束缚人的自由思想,等等;但也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神童;有过群星灿烂的文豪和科学家,数千年之中也创造过惊动世界的文明。况且五四以来,文言文和当代口语的严重脱节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可见,回头看看传统的语文训练,想想其中有什么可供参考的方法,这绝不是无稽之谈。

本文正是从汉语汉字的基本特点出发,参考了传统的启蒙教育方法和近一个世纪以

来新学的各种试验成果,提出了“基本字集中教学法”的设想。许多事实使我们相信,这种教学法在华文教育中不但是可行的,做得好的话可能还更加有效。

基本字集中教学法就是先集中教学最常用的基本字的字形及主要读音和主要义项,使学生掌握组字成词、理解词义的自学方法,而后通过大量拼读、认读以扩大词汇量,从而提高听说读写的整体水平。

为什么要先集中识字呢?因为汉语的词都是由字组成的,大多数字义和组成复音词后的语素义是一致的(工人是“做工的人”,农民是“务农之民”),尤其是成年入学习时,更可以利用汉字和汉语的这种奇妙关系,“望文生义”,无师自通,由少量已识的字推知大量未识的词。

在谈到小学六年“以文带字”才完成 3000 字的教学时,许嘉璐先生说:“由于受到识字量的限制,要说的话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已经形成的语言和思维能力……得不到有效的提高,——还受到了抑制,错过了一个人语言和思维发展的最好时机。”对于思维能力更加成熟的成年人来说,集中识字,及早提高阅读能力,自有更加重要的意义。^①

什么是“基本字”呢?基本字就是最常用的和构词能力最强的字。汉字总量多达数万,其实常用的只有 3000 左右。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在 180 万字的统计材料中,最常用的汉字的字数及其累计出现次数和累计频率如下表:

最常用字	累计出现次数	累计频率
前 300 字	1251263 次	69.2%
前 500 字	1442176 次	79.76%
前 1000 字	1651994 次	91.36%

据上书,最常用字的构词能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用 100 个构词能力最强的字可以构成 13928 个词。最常用的字往往构成最常用的词,越是常用词,单音词越多:

高频词	其中单音词	所占比例
前 300 个	231 个	百分 77

认得一个字,至少就掌握了一个单音词。几个单音语素;就可以推出一大批多音词来。何乐而不为呢!

不但字的频度差距大,词的频度差距也很大,在教学中也应该贯彻“常用先学”的原则。仍据上引书,在生活口语的 4000 个高频词中,前 300 个高频词的出现累计频率达 69.04%。

可见,掌握了一批最常用的字,就可以掌握大批常用的单音词和多音词。

越常用的字往往异读多,义项也多,常见音和生僻音,常见义和生僻义的频度也是很不相同的。教常用的基本字不能只教一音一义,也不能把所有的音义都教全,而应该先选教其中的常见音和常用义。

常用字所能造出来的词数量极大。如上文所列前 100 个高频字可以造词近 1 万 4 千个。在通过常用字认识常用字所构成的词语中也只能先选教其中的常用词。

例如在构词能力最强的头 20 个常用字中,可以选出 60 个常用词:

人:大人 小人 工人 生人 气人 无人 头人

气:天气 小气 水气 大气 人气 生气 手气
 心:一心 小心 人心 手心 地心 无心
 头:人头 心头 气头 手头 工头 头发
 尘:人生 小生 一生 天尘 发生 花生
 色:水色 天色 一色 气色 花色
 地:大地 心地 工地 天地 生地
 工:小工 人工 手工 天工 民工
 手:人手 生手 一手
 花:心花 水花 天花
 子:头子 天子 小子
 水:生水 天水 大水

然而,我们现行的教材是否贯彻了“常用先学”的原则呢?据李镗统计,小学课本的课文都有十多万字,但 1500 个常用字还漏收了百余个(北京版 154,人教版 113)。如果就生字表统计,3500 个常用字只出现了 2248(人教版)和 2079(北京版)^②。可见编教材的人并未严格贯彻“常用先学”的原则,也并未重视利用汉字频率统计的研究成果。

集中教学基本字并不是不要教拼音,而应该穿插着教拼音,使学生能自己拼读生字,全面掌握字的音、形、义。以往教学拼音时不教汉字,单词只能一个个学,掌握拼音和常用词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先教汉字并同时掌握拼音,把字的形、音、义三者联系起来,则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批地掌握词汇。

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往往把教学汉字视若畏途,迟迟不教汉字,又把汉语拼音的教学时间拖得太长,往往使学生厌烦。先教常用字,其字形一般都比较简单,易学而有趣。按一般经验,即使是西方的学生,刚开始教学汉字时,也总是兴奋不已的,如果能用基本字集中教学法使他们迅速学到大量常用字和常用词,这种学习积极性一定可以保持下来的。

为了学好基本字,在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上也要有许多配套措施。最好用基本字编成句子短、内容有趣而又朗朗上口的韵文,加注拼音,使学生能读能唱。此外,还应编些生动有趣的短文,供学生以字推词,进行认读练习。

基本字的教学可以按 100 个高频词、300 个高频词和 1000 个高频词分为三个教学阶段,每升一级都同时复习前段学习内容,配有生字表、基本课文、认读课文。每个阶段有一个测试标准,并且编成学生可以自测的材料,让学生自学自测。

1997 年,在总结几十年来全国各地开展的 21 种识字教学法时,对于识字教学这一语文教育的永恒课题,郝家杰说:“快速高效是现时代识字教学改革的突出特点。”“完善体系是新世纪对识字教学的呼唤。”“科学化是识字教学实验的内在需求。”^③基本字集中教学法正是瞄准了“快速高效”这个目标,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的特殊关系,以字词的频度为科学根据而提出来的。要落实这一套识字教学法,自然还需要重新编制一个教学大纲,编写一套准确而适当的教材,包括基本教材,教学参考书,学生自学读物。然后还要在试验班里开展教学试验。完全可以相信,只要有认真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一定可以摸索出一套科学而有效的教学方法来。

(下转第 14 页)

工程”,当作继承优良传统、提高民族素质、参与时代竞争的“海外希望工程”,当作增进中外友谊的桥梁和贯通东西文化的纽带;许多华侨华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也把支持、发展华文教育当作加强相互理解与合作、促进对华经济活动的契机。潘懋元先生说,“可以预见,新世纪的海外华文教育必将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担负起历史赋予的艰巨而又崇高的使命。”^④

潘先生对海外华文教育和国内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研究者寄予厚望。他祝愿《海外华文教育》“努力开拓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在服务海外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和促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充满活力,大有作为,为推进新世纪海外华文教育的繁荣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⑤这不仅是对《海外华文教育》的期望,也是对我们华文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提出的要求与目标。

注

①②林蒲田主编:《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概论》,“序”,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⑤⑥⑦⑩⑬潘懋元:《开拓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促进华文教育的繁荣与发展》,《海外华文教育》2000年第1期。

④⑨⑪⑫⑭潘懋元、张应强:《海外华文教育与弘扬中华文化》,《教育研究》1996年第3期。

⑧⑩潘懋元、张应强:《华文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彰显》,《东南学术》199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潘懋元、王伟廉:1995,《高等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潘懋元:1996,《新编高等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潘懋元:2000,《潘懋元论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

王伟廉、杨广云:2000,《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科学》,中国华侨出版社。

林蒲田:1995,《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苏明明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上接第22页)

注

①许嘉璐:《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137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②李饴:《中小学语文课文字词分布统计及应用价值》,《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3期。

③郝家杰:《人民教育》,1997年6月号。

(李如龙 厦门大学中文系)